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黄晓宇，刘建华

（郑州大学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摘要：为了推动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探索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复合路径，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基于TOE框架选取黄河流域19个典型的旅游城市展开综合案例研究，分析其多重因素复合对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受数字基础建设、智慧旅游、区域协调管理、文旅融合、创新投入、市场潜力需求和生态保护等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的影响；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表明，存在三条提高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即政府-科技双驱型、多元共创型和政府导向型；区域视角下，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驱动路径存在空间差异性，上游区域的驱动路径较为单一，中游区域的发展路径相对多样，下游区域的驱动路径则具有更强的分散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TOE框架；组态分析；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C93-03；F061.1；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8－0160－11

2023年7月以来，“新质生产力”概念开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受到高度关注，被视为推动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演进路径，呈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以及绿色低碳等特征，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提高区域经济增速、实现业态融合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3]，大力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24年9月12日的甘肃座谈会对于黄河文化作出重要指示，建设一批能够充分展现黄河文化的标志性旅游目的地。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做出新的部署[4]，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并将其视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源泉。全会强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与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加快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文化、旅游等服务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空间。全会还提出完善现代服务业体系、扩大高品质文化供给、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能级，为文旅产业通过数字化、科技化、绿色化路径培育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然而，当前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不均、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数字技术转型困难等[5]。在加快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以及数字文旅发展的时代环境中，探索新质生产力如何驱动黄河流域文旅高水平发展，深入研究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发展特征和实践路径等，对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战略价值。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引发学界广泛探讨和研究，其理论内涵的本质体现为“创新驱动质量跃迁”[6]。“创新性”特质具体表现为：突破既往生产力理论的局限，将技术革新作为核心动力，借助前沿科技、创新模式及先进理念实现生产效能的优化。而“质量跃迁”的内涵则指：这是社会持续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崭新形态，不仅意味着生产水平的提质增效，更标志着从传统低效生产体系向现代高效生产

收稿日期：2025-11-12

作者简介：黄晓宇(1993—)，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通信作者刘建华(1963—)，男，河南郑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区域发展战略。

系统的跨越式升级[7]。量化评估方面,多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三要素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8],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针对中国多产业部门(涵盖农业、工业等)[9-10]及典型区域(如黄河流域)[11]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系统定量解析其时序演变规律、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实践路径方面,主要从技术创新、组织关系和制度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探索。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现代演绎表明,科技创新不仅构成新质生产力的质态内核[12],更通过"技术-质量"双驱动机制推动产业升级[13]。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催生智能劳动工具和数字化劳动对象实现技术跃迁[14]。对于某些关键领域改革要构建起同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新型生产关系,达成先进技术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高效配合和协同工作[8],在制度调适与政策改进方面,为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供给环境保障[15]。

现有文献对于文旅新质生产力也有了初步的研究,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在定性研究方面,围绕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实践路径、现实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展开研究。从内涵来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对文旅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以实现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和绿色低碳效益,从而实现文旅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16]。从实践路径看,提出包括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融合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及塑造绿色生产力等措施[17]。从现实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看,文旅新质生产力当前仍面临数字技术应用的业务生态落地滞缓、生产关系调节亟须优化、高质量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短板等诸多现实挑战[18],有学者提出"五链协同"赋能框架,通过升级文旅产业体系能级、驱动智能数据系统跃迁、优化绿色金融资源配置效能、拓展创新人才视野与能力纵深、完善政策制度保障机制等多维路径,为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撑导向[19]。在定量研究方面,采用熵值法建立以文旅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为核心的文旅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指标,对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并分析区域差异[20],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区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时空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21]。

已有研究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量化评估与实现路径展开了初步探索,普遍认为其核心在于以创新为驱动,通过突破传统增长路径,实现以高科技、高效能和高品质为特征的经济发展。然而,现有研究的重心仍主要集中在农业[22]和工业[23]等第一、二产业,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领域的关注明显不足,尤其是对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的系统研究仍较为匮乏。尽管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文旅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一些关于其概念界定与实践路径的定性分析,并在省级层面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与量化测度方法[24],但对于流域尺度(如黄河流域)中技术、组织与环境等多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并影响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仍缺乏深入的量化探讨。基于此,开展区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与发展路径研究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也具有理论拓展价值。为弥补现有研究在多因素交互作用及区域差异性方面的不足,在 TOE 理论框架下,引入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系统识别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多路径形成机制,从而为因地制宜提升文旅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1 研究框架和方法

1.1 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发展机制

文旅新质生产力,是指将科技创新引领下的新型生产力在文旅场景中创造性应用,以此促进全要素生产效率逐步提升、关键要素质量持续优化、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日臻完善以及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最终达成文旅产业深度协同发展[25]。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保护、传承与弘扬黄河文化,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组织协调提供优质的发展环境,市场主体多元创新发展,融合效能相互转化,实现文化与旅游高质量融合与服务供给[26]。因此,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需要从技术创新、组织协同和环境驱动三个维度来分析。

1.1.1 技术创新

在文旅产业升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2020 年 11 月,国家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着重强调,依托前沿数字技术重构文化产业的创新增长机制,通过优化服务供应体系、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深化文旅协同发展、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完善产业生态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突破[27]。这一政策导向与黄河流域所秉持的"科技多元化支撑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理念高度契合。基于此,黄河流域亟须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数字化与服务型制造转型进程,把握国家数字经济

战略机遇，持续推进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开发，着力延伸价值链条与扩展产业链条，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中的聚合效应与创新驱动力。

1.1.2 组织协同

对于文旅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黄河流域自然条件独特、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文化和旅游产业里，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合作平台的搭建，整合资源[28]，协同合作，打破文旅产业“数据孤岛”与资源壁垒，推动文化遗存、数字技术、生态资源等要素的高效匹配，进而创新文旅市场服务。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下，这种机制不仅加速了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29]。因此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跨区域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释放更深层次的产业变革动能。

1.1.3 环境影响

在文旅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黄河流域作为生态脆弱区与文化富集带的双重属性，其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环境影响深度交织。环境影响通过生态约束、政策导向等路径，推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向生态化、数字化、融合化转型，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18]。一方面，文旅市场逐渐形成了以消费需求为外部动力的新兴增长模式，文旅业态及其产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供给表征是受消费转型和升级影响的，消费周期决定产业、业态和产品的发展阶段，消费升级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细分催生新业态裂变。另一方面，黄河流域面临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等生态瓶颈，迫使政府通过战略刚性约束和专项治理投入，使文旅开发从“粗放式扩张”转向“精细化运营”。因此，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即以绿色低碳发展为鲜明特质，以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为重要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2 TOE框架：影响要素的分析视角

选择 Tornatizky 和 Fleischer[30] 提出的 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为分析视角，识别影响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使用 TOE 框架主要有两个必要性：一是既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组织协同和环境制度被认为是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和重要保障[31-32]。TOE 框架通过“技术-组织-环境”三维度整合，可系统识别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多层级影响因素，弥补单一要素分析的局限性。二是有研究基于要素联动视角，指出技术、组织、环境要素中的二者或三者会共同作用于文旅创新效能。一方面，TOE 要素有效协同促进了正向结果的形成，如技术赋能与组织能力的互动可激活环境要素，推动服务共创[33]；另一方面 TOE 要素无效协同则无法形成正向结果，组织要素短板会削弱技术投入效用，导致环境资源无法高效利用，生产关系亟须优化[18]。由此 TOE 框架基于技术应用情境的综合性特征[34]，与文旅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创新、制度重构、生态适配的多维发展逻辑高度契合，能够有效支撑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差异化研究。

1.3 研究框架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在 TOE 框架的基础下，构建了一个以“技术-组织-环境”为影响要素的研究框架。

1.3.1 技术条件

技术条件包括数字基础建设[35]和智慧旅游[35]2个二级条件。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旅游的基础保障，包括 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这些技术的集合共同构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强大矩阵，还衍生出各种类型的数字平台。智慧旅游基于数字技术等先进技术的信息咨询服务，相比传统旅游业态，智慧旅游借助其管理智能化、服务智慧化及营销精准化三个维度，充分响应游客对高效便捷出行的需求，支撑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涵盖前沿技术应用、先进制造模式、创新服务体系、新兴业态形式及多元化应用场景等要素，与智慧旅游所具备的技术密集型设备、创新实践场景及专业化人才队伍等特质高度契合[36]。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全面支撑，可以优化智慧旅游的管理和运营效率、提高服务水平和产品创新，为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底”保障。

1.3.2 组织条件

组织条件包括区域协调管理[37]、文旅融合[38]和创新投入[11]3个二级条件。黄河流域所涉的9个省级行政区基于各城市的独特发展禀赋与条件，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推动城市间的有序衔接与协同发

展,协调黄河流域九省间的矛盾分歧,推动文旅跨区域合作得以高效、有序实施。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既是实现区域协调管理的必要手段,也是黄河流域文旅融合进入深层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把握新质生产力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着力点,以创新驱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增加科技创新的经费投入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文旅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更精细化方向发展。

1.3.3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包括市场需求潜力[39]和生态保护[40]2个二级条件。在文化和旅游领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需要文旅新质消费力的支撑,而游客满意是文旅消费进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形成文旅新质消费力发育的环境,才能有效地推动文旅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另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秉持问题引领方向的原则,化解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冲突,施行切实举措拓展文旅业态种类,是文化和旅游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新促质,核心特征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性突破,从技术创新-组织协同-环境驱动3个维度探索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然而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多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体系构建,侧重于考察技术、组织、环境等单一因素对培育和发展文旅产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但对于多重变量因素复合协同作用下对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在复杂组织治理中,“组态视角”被广泛用于理解组织结果背后的因果复杂性[41]。该视角指出,多重影响因素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并且可以通过差异化的排列组合来达到影响组织结果的共同目的,例如,陈曦等[35]在数字治理与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的研究中采用fsQCA的方法,得到了影响其高质量服务供给的6个关键要素和3条驱动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的关键路径。鉴于此,本文采用组态视角,在TOE框架下选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作为研究工具,旨在探究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复杂因果机制,并揭示其路径选择的多样性。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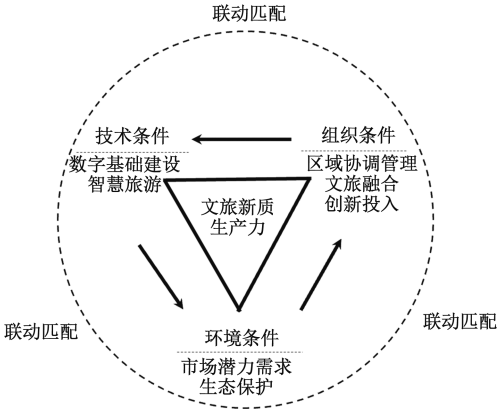


图1 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城市的选择标准

选择《2024年中国黄河城市旅游发展报告》中统计的2023年旅游接待人数Top10(郑州、洛阳、济南、开封、兰州、泰安、渭南、济宁、焦作、淄博)和2023年旅游收入Top10(郑州、济南、洛阳、泰安、呼和浩特、济宁、开封、兰州、淄博、焦作)的黄河城市作为案例城市。

文化和旅游部在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推进活动上发布了黄河古都新城之旅主题线路,其中组成这条线路的所有城市(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榆林、韩城、西安、大同、平遥、太原、洛阳、郑州、开封、安阳、泰安、济南)作为选择目标,其中韩城、平遥为县级市,为了统一标准,选择其所在的渭南和晋中作为案例城市。

鉴于此,以黄河流域流经的9个省份的19个重要旅游城市为研究样本,分别是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榆林、渭南、西安、大同、晋中、太原、安阳、郑州、洛阳、焦作、开封、济南、泰安、济宁和淄博,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多要素联动的复杂因果机制和发展路径。

2.2 数据收集来源和校准

研究资料和数据收集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出台文件及媒体报道等。以2023年各城市统计公报作为基础数据源,同时结合各个城市财政局的统计数据,提供了案例城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旅游人数增长率、R&D的经费投入和节能环保支出等相关数据。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工信局、省通信管理局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出各案例城市的5G基站数量、是否出台跨区域文旅合作政策和是否入选国家50个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示范区。各案例城市智慧旅游应用场景的数据来源于各市文旅部门访谈、在线旅游平台、社交媒体及媒体报道等资料的多重验证。

fsQCA 数据建构包括测量和校准两个步骤。其中，校准的核心在于为研究样本分配集合关联度数值[42]，主要存在两种操作路径：直接校准依托研究者预先确定的三个基准点进行数值关联，间接校准基于案例在目标集合中的关联程度实施多层次分类。需特别强调的是，校准过程需要兼顾理论框架与实证特征，避免模式化处理。基于此原则，在具体变量处理中采取实证导向的标定策略，充分融合质性数据与案例实态特征开展操作。

2.3　结果变量

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基于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从文旅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3 个维度构建文旅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因此，在进行结果变量的量化指标设定时，参照李星明等[20]、朱怡婷等[21]的研究思路构建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计算结果变量各指标所占的权重，再根据线性加权法综合测出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43]，具体如表 1 所示。

2.4　前因条件

(1)数字基础建设。在数字化浪潮下，5G 技术凭借高速率、高吞吐量与低延时优势，为数字平台筑牢根基，成为其关键技术支撑。对于旅游产业，它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成数字集群，衍生智慧监管、全真体验、虚拟展览等多种文旅产业的新业态。依循《中国城市 5G 发展指数报告》，以 2023 年底各市基站数量为量化指标赋值[44]。

此指标不仅反映 5G 建设程度，更折射数字技术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潜力，为后续探究两者融合的技术适配、市场机制与创新路径等问题提供数据与切入点，助力旅游产业数字化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2)智慧旅游。智慧旅游是在传统旅游模式上的转型升级，体现了区域文旅数字资源和数字应用的供给水平，代表了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不同城市体现的差异表现为：在泰安、呼和浩特这类资源导向型旅游目的地，智慧旅游建设侧重于景区的预约预订智能化、导览解说数字化等应用，游客所能获取的体验形式较为有限；在郑州、西安等体验驱动型城市，其智慧旅游布局不仅覆盖景区智能化建设，更延伸至全域旅游营销推广、交通智能调度、住宿智能化管理等多个领域，构建出更为完善的服务供给体系。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联合发布的《智慧旅游场景应用指南(试行)》中颁布了 10 类智慧旅游典型应用场景，以各市所实际具备的 10 类智慧应用场景的具体数量作为关键赋值依据，以此来衡量各地在智慧旅游建设领域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应用程度[45]。

(3)区域协调管理。《“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开始提出，做强跨区域旅游城市群，优化空间布局，构筑新型旅游功能区[46]。选取各市跨区域合作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和执行情况作为其衡量指标。在此过程中特别注重结合各方资料来确认政策是否具有真实执行力以及是否有执行效果。以“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未出台文旅跨区域合作政策判定为完全不隶属，校准为 0；以在一个五年计划中出台相关文件判定为偏隶属，校准为 0.5；以在两个五年计划中全都出台过相关政策判定为完全隶属，校准为 1。

表 1　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量化指标

结果变量	衡量指标	变量	变量定义	指标权重	属性
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文旅新质劳动者	劳动者人才规模	中高等院校文旅专业学生规模	0.09	正向
		劳动者结构	旅游产业科技人才数/万人	0.04	正向
			文化产业科技人才数/万人	0.07	正向
			信息服务业人数/万人	0.07	正向
		劳动者效能	每万人发明文旅专 利授权量	0.05	正向
			文旅收入占比	0.04	正向
	文旅新质劳动资料	文旅配套供给	星级饭店数/个	0.02	正向
			旅行社数/个	0.03	正向
		文旅数字化	文旅电子商务交易额/亿元	0.08	正向
			文旅企业数字化水平/%	0.13	正向
		文旅科技创新	旅游相关专利申请量/项	0.07	正向
			文旅产业 R&D 人员	0.13	正向
			技术合同成交额占 GDP 比例	0.10	正向
	文旅新质劳动对象	文化遗产资源	3A 级及以上景区数/个	0.05	正向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个	0.02	正向
		文旅绿色发展水平	植被覆盖率/%	0.01	正向

(4)文旅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的通知》,确定了首批50个文旅融合示范区[47]。以是否入选国家50个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示范区对该条件进行赋值,是则赋值1,反之赋值0。

(5)创新投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到,R&D经费投入强度可以反映地区科技创新的投入水平和科技资源的分布情况[48]。以2023年各城市R&D经费投入强度、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和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的综合指标对该条件赋值。

(6)市场需求潜力。文旅市场的高潜力意味着存在更多的商机和需求,也是鼓励政府和企业不断创新和变革的重要前提。因此采用地级市级出游人数增长率来衡量文旅市场的需求潜力[5],以实际增长率对该条件赋值。

(7)生态保护。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方向,在创新理念的驱动下,全方位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与升级,从而催生并形成了绿色生产力。这种基于创新驱动的绿色生产力,对文化和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以2023年政府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对该条件赋值[41]。

在校准方面,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智慧旅游、创新投入、市场需求潜力和生态保护采用直接校准法,选取样本数据的95%、50%、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校准标准;其余条件采用间接校准法。如表2所示。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是对单一条件在结果中的必要性进行检验,当条件一致性水平大于0.9且覆盖度大于0.5时,该条件可能为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如表3所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于是可以判定,不存在产生高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前因条件进行组态分析。

3.2 驱动路径分析

分析阈值设定如下:①在频数阈值上,考虑到19个座城市组成的中小样本,可采用较低阈值,因此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②一致性衡量了每个组态是结果集合子集的程度,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③PRI一致性可以用于避免在结果和非结果中同时存在组态的子集关系,该值应接近原始一致性分数,故将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43]。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得到5条提高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其中组态H2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大于其他组态,说明该组态可以契合黄河流域更多的案例城市的驱动路径,而其他4条组态路径则具有偶发性和分散性。对比分析各驱动路径,发现在5条发展路径中,数字基础设施支撑、

表3 必要性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文旅新质生产力		非高文旅新质生产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数字基础建设	0.812 846	0.832 430	0.430 612	0.544 633
非数字基础建设	0.555 347	0.441 256	0.867 511	0.851 294
智慧旅游	0.645 924	0.575 359	0.564 054	0.620 560
非智慧旅游	0.574 050	0.516 020	0.614 059	0.681 717
区域协调管理	0.898 130	0.584 654	0.790 837	0.635 807
非区域协调管理	0.440 536	0.630 365	0.483 380	0.854 233
文旅融合	0.887 778	0.641 533	0.773 026	0.689 901
非文旅融合	0.570 874	0.670 674	0.598 343	0.868 159
创新投入	0.789 437	0.761 661	0.470 521	0.560 663
非创新投入	0.544 642	0.454 412	0.799 981	0.827 535
市场需求潜力	0.543 456	0.460 572	0.790 647	0.827 535
非市场需求潜力	0.796 495	0.754 934	0.484 618	0.567 287
生态保护	0.715 445	0.618 027	0.628 536	0.670 562
非生态保护	0.618 633	0.574 189	0.641 966	0.735 888

表2 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和锚点

主要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算方法	锚点
结果变量	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	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熵值法	0.70,0.18,0.10
条件变量	技术条件	数字基础建设	截至2023年底5G基站数量/个	47 692,8 885,5 738
		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场景应用指南(试行)》提到的智慧应用场景数量/个	10,8,5
	组织条件	区域协调管理	“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是否出台文旅跨区域合作政策	1,0.5,0
		文旅融合	是否入选50个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示范区	1,0
		创新投入	2023年R&D经费投入强度/%	3.89,2.30,0.24
	环境条件	市场需求潜力	2023年地级市旅游人数增长率/%	356.73,73.50,19.28
		生态保护	2023年环境保护支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7.14,2.23,0.70

表 4　高文旅新质生产力的组态分析

变量	H1a	H1b	H2	H3a	H3b
数字基础建设	●	●	●	○	○
智慧旅游	×			●	○
区域协调管理	●	●	●	●	●
文旅融合	●	●	●	●	●
创新投入		●	●	○	○
市场需求潜力	×	×		×	×
生态保护			●	○	●
一致性	0.956 982	0.956 090	0.960 332	0.850 286	0.809 255
原始覆盖度	0.340 195	0.566 051	0.598 047	0.227 150	0.269 498
唯一覆盖度	0.017 763	0.012 822	0.060 228	0.069 521	0.049 524
解的一致性	0.717 658				
解的覆盖度	0.908 364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跨区域协同治理与创新资源投入呈现显著集中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均属于组织协调层面的关键要素，说明现阶段高水平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主要依赖组织协调机制驱动发展。其中 4 条驱动路径中市场需求潜力都是缺失状态，说明即便是在黄河流域高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城市中，文旅市场潜力的也尚未被完全激发，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这 5 条组态路径重要影响因素的不同，可进一步将其归纳划分为以下 3 条驱动路径。

（1）政府-科技双驱型。可以对应组态 H1a 和 H1b，H1a 表明以数字基础建设、区域协调管理为核心条件，文旅融合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提高文旅新质生产力的目标。符合该组态特征的城市有太原、开封和济宁等。该组态城市中，其共同点是智慧旅游发展还不是特别成熟，但通过建设 5G 基站，搭建数字技术平台，以数据支撑的动态能力跟踪感知旅游市场的动态变化，协调各个部门工作并及时做出工作调整，通过政府协作和数字技术平台双驱动的方式推动了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 H1a 相比，H1b 拥有更多的创新投入，该组态的影响因素更加完备，符合该组态特征的城市有济南、泰安和淄博。以济南为例，依托“泉城”文化底蕴与数字技术优势，以 5G 网络为底座，通过场景创新、数据驱动和业态融合，构建全域智慧旅游体系，成为黄河流域文旅数字化转型的标杆城市。2023 年底实现全市 3A 级以上景区、文化场馆、交通枢纽 5G 网络 100％覆盖。大明湖超然楼实现全国首个“5G＋Wi-Fi 7”双千兆景区，支持万人级并发 AR 实时交互；与郑州、西安等沿黄城市共建“黄河文旅链”，实现景区门票、非遗 IP 等数字资产跨省流通，2023 年互送游客超 120 万人次。

（2）多元共创型。该类型对应组态 H2 基于组态视角的实证研究表明，以数字基础建设、区域协调管理、创新投入与生态保护为核心驱动要素，文旅融合为协同支撑要素的区域，能够有效实现文旅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跃升。此类区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形成技术赋能底座，政府主导的多元协同机制构建制度创新框架，而生态约束与文化增值的双向互动催生差异化竞争力。通过技术、组织、环境三重维度的系统性交互，形成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提升闭环。兰州、西安、郑州、洛阳等黄河流域核心城市呈现显著适配性，例如，洛阳隋唐洛阳城遗址通过数字孪生平台实现遗址保护与虚拟开发的动态平衡，游客容量提升的同时文物风化速率下降；郑州采用数字孪生技术重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筑布局，减少实体用地，提高了单位面积游客承载量。

（3）政府导向型。可以对应组态 H3a 和 H3b，这两个组态对应的驱动路径的共同点是其关键要素均是区域协调管理和文旅融合，智慧旅游和生态保护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替代关系。在 H3a 的组态中，缺失了数字基础建设、创新投入、市场需求潜力和生态保护 4 个影响因素，但其文旅融合发展可以达到较高水平，说明加强智慧旅游建设，加强政府管理协作，出台文旅融合政策建设示范区，可以实现提高文旅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榆林、呼和浩特等城市符合该组态特征。随着智慧旅游建设的逐步完善，可以持续密切地追踪旅游市场的动态趋势，能够依据多样化的业务需求精准筛选合适的合作主体，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参照既有文献做法，将 fsQCA 分析中的一致性标准由 0.8 提升至 0.9，并再次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运算。结果显示，所有识别出的核心路径均保持稳定，证实了前述发现的稳健性。

3.3　驱动路径的空间分布差异

受到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黄河流域的文旅产业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为了进一步探究驱动我国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的文旅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将所选的 19 个城市按照区位划分为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分别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区域条件下高文旅新质生产力的组态分析

变量	黄河上游		黄河中游			黄河下游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W9
数字基础建设	●	●	×	×	●	●	●	●	×
智慧旅游	●	×	●	×	●	×	●	●	×
区域协调管理	●	●	●	●	●	●	●	●	×
文旅融合	×	●	●	●	●	●	●	●	●
创新投入	●	●	×	×	●	×	×	●	●
市场需求潜力	●	×	×	×	×	×	×	●	●
生态保护	×	●	×	●	●	×	●	●	●
一致性	1.000 000	1.000 000	1.000 000	0.942761	1.000 000	1.000 000	0.860 140	1.000 000	1.000 000
原始覆盖度	0.340 000	0.310 000	0.255 056	0.314607	0.333333	0.200 710	0.218 472	0.208 069	0.269 221
唯一覆盖度	0.275 000	0.245 000	0.161 423	0.220974	0.254682	0.119 513	0.122 05	0.060 8982	0.114 438
解的一致性	0.789 700		0.712 538			0.748 977			
解的覆盖度	0.920 000		0.872 659			0.650 343			

●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1)黄河上游地区,存在 W1 和 W2 两种组态,经过分析可得出,这两种组态的核心要素都是数字基础建设和创新投入,因此将这两种组态归纳为同一种类型,其典型城市为兰州和西宁。该类型城市由于区域位置的原因,相比黄河中下游城市,其数字化文旅建设的推进尤为困难。因此加快铺设 5G 基站的覆盖面积,增加文旅产业建设的创新投入,是推动其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

(2)黄河中游地区,存在 W3、W4 和 W5 三种组态,其中 W3、W4 和 H3a、H3b 的组态完全相同,将其归纳为同一种路径——政府导向型,榆林、大同等符合该组态特征。该类型城市受技术或环境条件的限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转化率低,更依赖于政府组织的协调和资源整合。相比之下组态 W5 的影响因素较为完备,只缺少了市场需求潜力这一影响要素,对应的城市为西安。2018 年西安在政府引导下搭建起抖音公司为主、政府各部门协同的数字合作平台。政府方面由西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协调,文博机构挖掘文旅融合特色,多方协作打造西安文旅产业营销新模式,孵化了大唐不夜城、盛唐密盒等网红文旅产品。这得益于政府有计划、有规模的推动,使其高效聚集和激发一大批游客参与到内容创作中,基于本地文旅资源创造出各类“新玩法”,持续输出形式丰富的优质旅游内容。

(3)黄河下游地区,存在 W6、W7、W8 和 W9 四种组态,相比黄河流域上中游城市,下游的驱动路径具有更强的分散性和差异性。组态 W6 与组态 H1 的路径特征相似,都是以数字基础建设和区域协调管理为关键核心要素,文旅融合为协同要素,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应城市为济南和泰安。组态 W7 在组态 W6 的基础上,增加了智慧旅游和生态保护的影响要素,典型城市为淄博。组态 W8 具备了提高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关键要素,对应的城市为郑州和洛阳。组态 W9 以市场需求潜力和生态保护为核心条件,文旅融合和创新投入为边缘条件,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焦作符合该路径特征。

综上所述,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上游区域的发展路径相对单一,受区域位置的影响,重视数字基础建设和创新投入,具备数字-创新双核驱动的发展特征。中游区域虽然驱动路径相对多样,但每条路径都存在影响因素缺失的情况,尤其是技术和环境部分,因此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的复合类型。下游区域的发展路径相比之下更加丰富,不同城市的差异化形成了多元路径分化发展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黄河流域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展开实证研究,以研究目的为导向选择模糊集定性分析(fsQCA)的研究方法,探究多重因素复合对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①基于 TOE 框架对 19 个城市的归纳分析,系统识别出影响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智慧旅游、区域协调管理、文旅融合、创新投入、市场需求潜力和生态保护。②基于上述要素构建影响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指标框架,对 19 个城市展开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视域下,得出 3 条提升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选择,即数字协作型、多元共创型和政府导向型。③在黄河流域区域视角下,进一步探究文旅新质生产力驱动路径的空间差异性,发现上游区域的驱动路

径较为单一，中游区域的发展路径相对多样，下游区域的驱动路径则具有更强的分散性和差异性。

4.2 建议

基于对黄河流域19个城市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影响要素归纳及要素组态模式分析，参考要素组态相近的发展模式，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向。依据本研究结论，提出几下四点建议。

(1)从政府-科技双驱型的驱动路径来看，数字基础建设和区域管理协同在推动旅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化技术渗透和区域协同，积极引入并深化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通过对海量游客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精准洞察游客的行为模式、兴趣偏好以及潜在需求，从而为智慧场景的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另外，通过技术标准化与算力共享，如统一物联网设备接口，降低跨系统整合成本；依托超算中心和人工智能岛等，实现算力系统的弹性调度，释放数字文旅的巨大潜力，助力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2)从多元共创型的驱动路径来看，那些深度耕耘文旅数智平台建设且已取得成效的地区，其数字化平台已具备相对成熟的架构与功能，旅游市场需求也渐趋饱和，游客数量的增长逐步趋于平稳态势。在此情形下，将重心聚焦于既有平台的持续迭代与优化升级工作之上，即优化技术转化。具体而言，可以强化对数据资源体系的全方位统筹管理，打破各部门、各业务板块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高效流通与共享。同时，深度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在不同场景下的融合应用，如基于游客历史数据的精准营销、依据景区实时数据的智能调度等，从而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与管理效率。另外，生态-经济价值转化机制是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难题的系统性方案。在黄河流域文旅高质量发展中，通过技术创新显化生态价值、制度设计保障交易公平、市场机制激活资源配置，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这一机制为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

(3)从政府导向型的驱动路径来看，在一些数智技术尚不完善和环境资源受限的地区，政府肩负着引领责任。精准把控数字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走向，确保其能够切实转化为实际效益，而非技术堆砌。具体而言，强化对文旅行业数字化进程的统筹规划与引导，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将区域内分散的文旅资源数据、游客行为数据以及媒体分析数据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整合与梳理。实行精准化的政策供给，如根据城市数字化成熟度(如5G覆盖率、数据平台完备性)匹配差异化的财政支持，审慎选定契合本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特色与市场需求的“破题”切入点，从而有的放矢地推动数智平台建设，实现文旅产业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

(4)从驱动路径的空间分布差异上来看，黄河流域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不同，驱动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区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色选择高效可行的发展驱动路径。上游区域受地理区位限制，文旅数字化进程滞后，生态敏感区技术应用成本高。因此，可以优先推进高海拔地区5G基站建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定向支持生态监测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中游区域文化遗产资源富集但转化率低，加强政府的导向作用，如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实现精准化服务供给，推进产业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协同发展。如建立黄河流域中游城市文旅联盟，推行“一票通”跨城旅游服务，整合晋、陕、豫三省非遗资源。设立文旅科技融合专项基金，对文化遗产数字化、智慧化展陈项目提供贴息贷款等政策。下游地区城市间发展梯度显著，聚焦核心要素禀赋集中配置优势资源，并注重发挥不同驱动因素间的协同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着力破解“强差异-弱协同”难题，以制度创新、场景再造、网络协同等方式体现新质生产力“要素配置效率”内核。例如，建立“资源-技术-服务”三维替代模型，通过智慧服务弥补自然资源不足，探索适配自身特征的文旅高质量发展范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2024(11)：4-6.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党建，2022(11)：4-28.

[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2021-10-09(001).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5] 孙国军，李家瑶，王子轩. 黄河流域数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与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J]. 干旱区地理，2026，49(1)：117-127.

[6] 徐政，陈佳，江小鹏.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6)：22-29.

[7] 蒲清平，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6)：1-11.

[8] 黄群慧，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2024(2)：15-24.
[9] 朱迪，叶林祥.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J]. 统计与决策，2024，40(9)：24-30.
[10] 马丹，朱彦瑾，何艾融，等. 新型工业化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来自我国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J]. 贵州省党校学报，2024(4)：75-87.
[11] 刘建华，闫静，王慧扬，等. 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演进及障碍因子诊断[J]. 人民黄河，2024，46(4)：1-7.
[12] 胡莹，刘镔. 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机制研究——基于马克思资本流通理论的视角[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1)：18-27.
[13] 钞小静，王宸威，王灿.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4(3)：108-117.
[14] 张夏恒，刘彩霞. 数据要素推进新质生产力实现的内在机制与路径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2024(3)：171-184.
[15] 李媛，熊婉辰.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多元培育路径研究——基于 TOE 框架的 fsQCA 分析[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8(4)：15-28.
[16] 叶紫青，张颖熙.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J]. 经济问题，2024(9)：16-23.
[17] 王金伟，陆林，王兆峰，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与科学问题[J]. 自然资源学报，2024，39(7)：1643-1663.
[18] 王琼，杨德才.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2024(7)：152-160.
[19] 明庆忠，闫昕，刘宏芳. “五链”融合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及实现路径[J]. 学术探索，2024(9)：40-49.
[20] 李星明，张鸿浩，周明闪，等. 中国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估及其区域差异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25，44(5)：908-923.
[21] 朱怡婷，梁桂仙，周春山，等. 新疆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J]. 干旱区地理，2026，49(1)：128-139.
[22] 杨传喜，梁慧楠，秦辉. 新质生产力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J]. 科技和产业，2025，25(3)：119-124.
[23] 郭梦. 中国制造业新质生产力测度、时空演进及区域差异[J]. 科技和产业，2025，25(18)：262-271.
[24] 师婧. 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J]. 科技和产业，2025，25(2)：143-152.
[25] 徐金海，陈琳琳.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路径[J]. 社会科学家，2025(2)：68-75.
[26] 刘英基，邹秉坤，王二红. 制度与服务：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逻辑——基于黄河沿线九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0(5)：9-18.
[27] 刘沛林，徐硕. 文旅新质生产力：内涵审视、支撑向度与实践路径[J]. 旅游导刊，2024，8(3)：34-47.
[28] 杨晓艳. 数字技术驱动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路径[J].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3，25(10)：53-58.
[29] 刘建华，王慧扬. 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及障碍因子研究[J]. 人民黄河，2023，45(1)：6-12.
[30] TORNATZKY L G，FLEISCHER M. The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Boise，USA：Lexington Books，1990.
[31] 徐宁，张香. 文旅深度融合与新质生产力有机衔接：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 企业经济，2024(12)：101-110.
[32] 祁述裕，邓雨龙. 论新质生产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4，40(3)：62-69.
[33] 齐承水. 生态·生产·生活：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意蕴阐释[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3)：63-73.
[34] 邱泽奇. 技术与组织：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J]. 社会学研究，2017，32(4)：167-192.
[35] 陈曦，白长虹，陈晔，等. 数字治理与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服务供给——基于 31 座中国城市的综合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3，39(10)：126-150.
[36] 余正勇，施雄天.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智慧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J]. 开发研究，2025(1)：97-105.
[37] 厉新建，宋昌耀，殷婷婷. 高质量文旅融合发展的学术再思考：难点和路径[J]. 旅游学刊，2022，37(2)：5-6.
[38] 厉新建. 完善文旅融合机制扎实推进示范区创建[N]. 中国旅游报，2023-02-07(003).
[39] 左冰，刘怡君. 文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条件组态与绩效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9)：76-90.
[40] 刘建华，黄亮朝，左其亭.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准则及量化研究[J]. 人民黄河，2020，42(9)：26-33.
[41] 张明，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2019，16(9)：1312-1323.
[42] 杜运周，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2017(6)：155-167.
[43] 杨宇. 多指标综合评价中赋权方法评析[J]. 统计与决策，2006(13)：17-19.
[44] 新基建系列之：中国城市 5G 发展指数报告[R]. 北京：36 氪研究院，2020.
[45] 智慧旅游场景应用指南(试行)[R]. 北京：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2022.
[46]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N]. 中国旅游报，2016-12-27(002).
[47] 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N]. 中国文化报，2022-12-26(001).
[48] 张仲伍，王倩，祁佳瑶，等.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沙漠，2025，45(6)：1-11.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UANG Xiaoyu, LIU Jian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explore the composite path of improv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sQCA) was adopted.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19 typical tourist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selected for comprehensive cas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ultiple factors on th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influenced by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mart tourism, regional coordinated management,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market potential demand,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sufficiency analysis of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three effective paths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new cultural and tourism qualities such as government technology dual drive, diversified co creation and government orientation.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riving path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driving path in the upstream region is relatively single, while the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midstream region is relatively diverse. The driving path in the downstream region has stronger dispersion and differences.

Key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culture and tourism; TOE framework; configuration analysis; development path